



# 百年來兩宋出使行記之研究

##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Diplomatic Itineraries of Song Dynasty in the Last Century

錢雲 (Qian Yun) \*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政權瓦解，地方割據勢力興起，北方游牧民族也乘機壯大。五代時期，舊唐故地不但未能出現統一國家，更因為契丹的強大，使得漢唐以來所建立的「中國——四夷」秩序分崩瓦解，並轉變為「國際」關係。「宋代雖然出現了統一國家，但是燕雲十六州被契丹所佔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國與宋對抗，契丹與西夏都對等地與宋同稱皇帝，而且宋王朝對遼每歲納幣，與西夏保持戰爭狀態，這時候，東亞的國際關係，已經與唐代只有唐稱君主、冊封周邊諸國成為藩國的時代大不一樣，從這一狀況來看，東亞從此開始了不承認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sup>1</sup> 因此，宋王朝不得不與其強鄰建立「平等」外交，漢唐時的「萬國來朝」的外交形式也隨之改變，代之以各國定期或不定期互派使臣、互通資訊，「出使行記」(itinerary) 應運而生。<sup>2</sup>

出使行記通常是以出使行程為線索，使臣以出使過程中所見所聞為內容，或上呈朝廷以供借鑒、或闡述自我情感與思想的一類文獻。按照寫作內容可大致分為兩類：詳細記錄出使過程（尤其是往來語言）的行程錄和

注重出使地政治、文化、風俗的異域遊記。行記不僅記敘了出使的路徑、形式，涉及到不同地區的歷史面貌，更蘊含了宋人對外部世界的情感與思考，有助於現代學者重建宋代外交的歷史、探討宋代外交理念與外交實踐、重新整理中國古代外交思想。本文希望在視野、學力所及的範圍內，對已有研究進行概述並作出相應的評論。文章將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行記史料整理情況的綜述，二是行記研究的綜述，三是對行記研究的特色和問題的反思及以後研究的展望。

### 一、史料整理

雖然早在清代朱彝尊的《日下舊聞考》(卷 37) 中已經提到，可以用「紀行之書」對宋遼、金之間的關係加以研究，並列出其所查找的書名，但直到 19 世紀末，有關研究才正式開始。在 19 世紀末東西方聚焦中國及其周邊的風潮下，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 最早開始關注出使行記並著手翻譯。他於 1897 年到 1898 年間在《東

\*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 616。

2 目前對使臣記錄的名稱，有「語錄」、奉使行程錄等，十分混亂。本文主張以「出使行記」來作為統一名稱。一方面可以符合這類文書以行程為線索、出使異域的性質，另一方面則「行記」符合宋人的慣用法，如牟巘有「袖中行記真圖畫，留向人間作奇特」等。目前英文學界有三種方式翻譯「出使行記」，分別為 Itinerary、Travel Record、Travel Diary。本文採用 Itinerary 來表達其內涵，因為 Itinerary 一詞更強調行程的固定化和官方使團的性質。而 Travel Record 在意涵上過於寬泛，不能表現出「出使行記」本身特有的官方背景。此外，「出使行記」不完全具有 Travel Diary 所表現出的私人化。

亞學報》(*Jornal Asiatique*)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將四份宋代「出使行記」翻譯為法文，<sup>3</sup>又於1904年在《通報》(*Toung Pao*)上發表了周輝《北轅錄》的法譯本。從沙畹對翻譯文本的選擇來看，起先他更關注包含「周邊」地理知識的文獻，因此在1898年《東亞學報》上他還翻譯了張棣有關金朝地理的《金虜圖經》。但隨著《北轅錄》的發現，引起他對「周邊」社會生活的研究興趣。<sup>4</sup>這兩層旨趣雖然在沙畹的譯文中未得以充分展開，但他將出使行記放置在「中國——周邊」的地理背景中，提示出使行記的學術價值，樹立了行記翻譯研究的典範，引導了後代西方學者在歷史地理(行程錄)與異域生活(異域遊記)兩個方向搜集、整理和研究史料。

此後陸續被譯為西文的宋代出使行記有：閔宣化(Joseph Mullie)法譯路振的《乘軺錄》、<sup>5</sup>何瞻(James M. Hargett)英譯范成大的《攬轡錄》、<sup>6</sup>俄譯和德譯《蒙鞑備錄》、<sup>7</sup>傅海波(Herbert Frank)英譯程卓的《使金錄》、<sup>8</sup>奚如谷(Stephen H. West)英譯樓鑰的《北行日

錄》之河北部分。<sup>9</sup>其中部分行記亦有學者撰寫了英文提要，收在吳德明(Y. Hervouet)主編的《宋代書錄》(*A Sung Bibliography*)一書中。<sup>10</sup>這些翻譯將所有篇幅完整、記載詳盡的宋代行記引介到國際學術界，為西方學者建立了對行記的認知框架，而許多散佚、零碎材料的整理則更依靠中國學者的努力。

王國維在1926年出版了《蒙鞑備錄箋證》、《黑鞑事略箋證》兩種宋人使蒙錄的校訂，他考訂兩書作者、內容，並得出《蒙鞑備錄》的作者是趙珙而非孟珙等論斷。<sup>11</sup>30年代，金毓黻在其主編的《遼海叢書》中共收錄《松漠記聞》和《使遼語錄》兩部「出使行記」，<sup>12</sup>並在《遼海叢書總目提要》中對兩書的版本進行了考訂並提示其史料的價值。<sup>13</sup>這兩位的研究雖然是在當時對國際漢學研究加以了回應，但都只是基於對邊疆史地某一具體問題的關注而引起對行記的研究興趣。傅樂煥於1936年寫成的《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則是將出使行記作為研究的中心，對宋臣使遼錄進行整體性

- 3 沙畹一共翻譯了5個文本，除4份宋人出使行記外，還有五代胡嶠的《陷虜記》(*Hsien-lu chi*, [1897], pp. 390-411)。4份出使記錄分別是《王沂公行程錄》(*Wang I-Kung hsing - ch'eng lu*, (1897), pp.412-419)、《富鄭公行程錄》(*Fu Cheng - kung hsing - ch'eng lu*, (1897), pp.430-436)、《宋綬契丹風俗》(*Sung Shou's relation*, (1897), pp.437-442)、《許亢宗奉使行程錄》(*Hsu K'ang - tsung itinerary*, (1898), pp.361-439)。Édouard Chavannes, "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les Joutchen," *Journal Asiatique*, 9 (1897): 377-442 and 11 (1898): 361-439。
- 4 Édouard Chavannes, "Pei Yuan Lou, Récit d'un voyage dans le nord," *Toung Pao* 5 (1904): 163-192。沙畹在文中將周輝誤作周輝。
- 5 Joseph Mullie, "Tch'eng-yao-lou Relation de Voyage de lou Tchen," *Geografiska Annaler* 17 (Stockholm, 1935): 413-433。另有日文翻譯，見田村実造，〈遼・宋交通資料注稿〉，《東方史論叢・第1：北方史專號》(奈良：養德社，1947)。
- 6 James M. Hargett, "Fan Ch'eng - ta's (1126-1193) *Lan-p'ei lu*: A Southern Sung Embassy Account,"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December 1984): pp. 119-177。還可參見 Hargett,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89): 147-149。另有日文翻譯，見范成大著，山本和義、西岡淳編，小川環樹譯，《吳船錄·攬轡錄·驂鸞錄》(東洋文庫 696) (東京：平凡社，2001)。
- 7 俄譯本見 N. Ts. Munkuev, *Men-da bei - lu*, "Polne Opisanie Mongolo- Tatar" (Moscow, 1975)。德譯見 Peter Olbricht and Elisabeth Pinks, *Meng-ta pei-lu und Hei-ta shih-lueh: chinesische Gesandtenberichte über die frühen Mongolen 1221 und 1237. "Nach Vorarbeiten von Erich Haenisch und Yao Ts'ung-wu"*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0)。
- 8 Herbert Frank, "A Sung Embassy Diary of 1211-1212: The *Shih-Chin Lu* of Ch'eng Cho," pp. 171-207。
- 9 由奚如谷翻譯為英文，文章尚未刊佈，僅有河南部分。在奚如谷的個人網頁有 PDF 文檔可供下載：[http://xirugu.com/Lou\\_Yue.html](http://xirugu.com/Lou_Yue.html)。
- 10 Yves Hervouet, *A Sung Bibliograph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其中有若松寬對《蒙鞑備錄》、《黑鞑事略》(頁110-111)，白樂日(Étienne Balazs)對《攬轡錄》(頁164-165)，斯波義信對《北行日錄》(頁166)所作的提要。
- 11 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1926)。
- 12 《遼海叢書》影印本，頁203-214、2541-2546。
- 13 《遼海叢書》本《松漠記聞》係據顧氏文房小說本重刊印行，「語至簡略，然紀良維故實之最古者，當推此書。」(頁3639)《使遼語錄》係據日本靜嘉堂藏宋刊本(原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本)重刊印行，認為「是書紀自宋入遼上京之行程，視薛映、富弼所紀為詳。」(頁3643)。

考察。<sup>14</sup> 文中傅樂煥試圖窮盡所有的使遼「語錄」(即「出使行記」),他利用宋元書志,檢索書名並考察實際存佚狀況,認為今存使遼錄僅有 7 種。<sup>15</sup> 傅樂煥明顯受到「語錄」名稱(如「語錄」、「行程錄」等)的影響,在查找書目時以名稱為判斷標準,致使他只發現了 7 種使遼錄,但他提示出以目錄學為路徑整理「出使行記」的方向。後趙永春以此方法重新整理出現存或殘存的使遼、金錄共 22 篇並進行箋注,<sup>16</sup> 李德輝的《晉唐兩宋行記輯校》,又補充整理宋代出使高麗等地的行記,<sup>17</sup> 更有助於對宋代出使行記進行全面的瞭解。這種多是藉由比較宋代書籍目錄的方法得出書名,再從各類文獻中搜羅材料,而直接從史料中輯佚行記則主要依靠保存行記較多的《三朝北盟會編》,這樣掩沒了許多保存於龐雜文獻中(如《宋會要輯稿》等)的未曾被宋元書志所記載的行記。

此外,賈敬顏撰有多篇「出使行記」箋注,於 2004 年結集出版,題為《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其中宋代的行記有 7 篇,對版本、內容(尤其是

地名、名物等)詳加考證,為後學研究提供條件。<sup>18</sup> 此外還有臺灣學者王民信對沈括《熙寧使虜圖抄》進行了箋證,<sup>19</sup> 並整理出版《南宋國信語錄四種》。<sup>20</sup> 旅法學者左景權鉤沉史籍補闕成《攬轡錄》校補本。<sup>21</sup> 香港學者陳學霖通過對《說郛》、《黃氏日鈔》、《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資治通鑑音注》中《攬轡錄》節文進行檢視,對《攬轡錄》的傳本進行了研究。<sup>22</sup>

劉浦江的《宋代使臣語錄考》是近年來基於文獻學對宋代「語錄」(行程錄為主)的中藥研究。他從使臣「語錄」的編撰、收錄等角度,勾勒出「語錄」在宋代時的「制度」,並對宋臣使遼、金「語錄」加以考訂、撰寫提要 and 辨析版本,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加深了當代學者對「語錄」的認識程度。<sup>23</sup>

## 二、行記研究

沙畹不僅在 19 世紀末重新「發現」了宋代的出使行記,還表述了他的兩個學術旨趣——邊疆史地研究與

- 14 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學季刊》5.4(1936): 165-194,後收入氏著,《遼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28。
- 15 分別為《乘輅錄》、《王沂公上契丹事》、《薛映記》、《富鄭公行程錄》、《宋綬上契丹事》、《陳襄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張舜民使遼錄》。傅樂煥從文本內容判斷《薛映記》與《富鄭公行程錄》是同一文本,指出沙畹在《遊行於契丹、女真的中國旅行家遊記》中將「富鄭」與「富弼」看作兩個人的錯誤,並從文本上判斷出《富鄭公行程錄》、《薛映記》、《王沂公上契丹事》出於《三朝契丹傳》並證明其為偽書。
- 16 趙永春,〈宋人出使遼金「語錄」研究〉,《史學史研究》1986.8: 47-54。在趙永春的《奉使遼金行程錄》中,他對這 22 篇行程錄進行了句讀、箋注。見趙永春,《奉使遼金行程錄》(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 17 李德輝,《晉唐兩宋行記輯校》(瀋陽:遼海出版社,2009)。可資補充趙永春研究的有:王延德《西州使程記》、陳靖《使高麗記》、宋敏求《入蕃錄》、佚名《蒲甘國行程錄》、檀林《大理國行程》、李若水《山西軍前和議奉使錄》、趙子砥《燕雲錄》、李正民《乙酉航海記》、洪皓《使金行程記》、沈瑄《南歸錄》、張棣《南歸行程記》(即《金虜圖經》,但這並非是一行記)、鄒伸之《使韃日錄》。
- 18 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含路振《乘輅錄》(頁 39-79)、王曾《上契丹事》(頁 80-103)、薛映《遼中境界》(頁 104-109)、宋綬《契丹風俗》(頁 110-121)、沈括《熙寧使契丹圖抄》(頁 122-169)、許亢宗行程錄》(頁 214-254)。
- 19 沈括著,王民信校注,《沈括熙寧使虜圖抄箋證》(臺北:學海出版社,1976)。
- 20 王民信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 4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 21 此書並以法文譯出,然一直未能刊佈,只能由已發表序言得知左先生整理的概況。左景權,〈范成大攬轡錄校補初編序〉、〈范成大攬轡錄校補增訂編序〉,《史學史研究》1990.4: 55-61。
- 22 陳學霖,〈范成大《攬轡錄》傳本探索〉,《宋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 241-265。
- 23 劉浦江,〈宋代使臣語錄考〉,張希清、田浩、黃寬重、于建設主編,《10-13 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253-296。



異域社會生活研究，這為學者提示了研究的方向、路徑，使邊疆史地與社會生活研究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要方向，歷史學家們紛紛試圖通過解讀「出使行記」的內容以重建出使行程、制度禮儀、社會風俗等歷史現象。

同時，文學研究者們將異域遊記概括為以日記為體裁、兼有描述與議論等表達方式、關注於歷史地理的一種文學形式。他們藉由文學體裁、表現手法、內容展現等方面對異域遊記的客觀內容與主觀情感進行分析。

### （一）史學的研究

受晚清以來西北史地之學的影響，早期主要側重於歷史地理的考察，著重在使臣行程、館驛等問題的考釋。<sup>24</sup> 在已提到的傅樂煥著《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中，詳細考訂了使臣出使行程中的館名與路線。王文楚在出使行記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史料，對從北宋東京至遼南京的行使館驛做了詳細整理，使得宋臣出使路徑得以在地理學上定點、定名。<sup>25</sup>

歷史地理的研究固然有益於重構宋遼外交的地理舞臺，但是作為宋朝使臣出使異域所記錄的文獻，尤其是內容較為豐富的異域遊記，不僅提供了出使地的地理、交通、城鎮風貌、商業狀況，還記載下外交中的禮儀、禮俗，這對研究者從社會史的角度來重現華北地方史、外交禮制史有著重要的價值。<sup>26</sup>

陳學霖在〈樓鑰使金所見之華北城鎮——《北行日錄》史料舉隅〉中將人文地理的研究與社會史的研究相

結合，通過描述樓鑰出使所經華北諸地的歷史地理、城市建築、社會風尚等方面，賦予歷史地理的研究以立體生動的面貌。<sup>27</sup> Barry Till 在《1067 年宋使遼事》(A Sung Embassy to the Liao Nation, 1067) 中試圖討論使臣出使過程的文化內涵和宋臣作為客使的經驗，<sup>28</sup> 並進一步解釋宋遼交涉中有關「禮」的爭議。但由於 Till 對這次出使背景的單薄闡釋，有關於外交禮儀的問題，沒有得到完滿地梳理，如何通過零散的記載重現外交禮制仍是值得反思的問題。除此之外，還有豐富的有關《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的研究，因已多為學界所知，本文在此不一一敘述。

近年來，學者們不只關注於出使行記的內容，也開始關注出使行記背後的制度、思想等多重因素，嘗試將其放置於宋代外交關係史、政治史的背景之中，去討論出使行記對構建宋朝認同、塑造異域形象中的作用。藍克利 (Christian Lamouroux) 在《由奇及異：宋使如遼記事》中不僅關心文本中的地理論述，還注意到這種地理論述為胡虜地理（如《武經總要》卷 16）的編寫提供條件，建立起出使行記與知識世界的關係。他還指出正是大量南方使臣出使北國並激發了宋、遼相異性的認識，促成一個由「奇」到「異」的敘述轉變，<sup>29</sup> 充分展現出知識世界與政治行為、出使行記之間的互動關係。在藍克利另一篇對〈乙卯如遼國別錄〉的研究中，則就 1074 至 1075 年間所發生的邊界危機，將地理研究與政治論辯的背景相結合，探討地理工具與國家空間、政治主權

24 在 Barry Till 的文章中已經注意到這個早期趨勢。見 Barry Till, "A Sung Embassy to the Liao Nation (1067)," *Canada-Mongolia Review* 1.1 (1975): 57.

25 王文楚，〈宋東京至遼南京驛路考〉，《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237-254。還可參見孫東虎，〈宋使遼境經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學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4 (2004): 23-35。

26 斯波義信在為《北行日錄》撰寫的提要中提出該行記不僅關乎地理、交通、城鎮風貌、商業狀況，還對宋金的外交禮俗問題有很重要的意義。(Yoshinobu Shiba, "Pei-hsing jih-lu," Yves Hervouet, ed., *A Sung Bibliography*, p.166.)

27 陳學霖，〈樓鑰使金所見之華北城鎮——《北行日錄》史料舉隅〉，《宋史論集》，頁 285-338。文章亦收於陳學霖，《金宋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199-240。

28 Barry Till, "A Sung Embassy to the Liao Nation (1067)," pp. 57-66.

29 Christian Lamouroux, "De l'étrangeté à la différence : les relations des émissaires Song en pays Liao (XIe siècle)," Claudine Salmon, éd., *Récits de voyages asiatiques - genres, mentalités* (Paris: EFEO, Études thématiques, 5, 1996), pp.101-126。中譯文見藍克利著，顧良譯，〈由奇及異：宋使如遼記事〉，《昆明社科》1996.6: 49-57。

的關係。<sup>30</sup> 萬安玲 (Linda Walton) 以樓鑰《北行日錄》為基礎，將政治、思想與歷史地理的研究相結合，分析了使臣在出使中充當的諜報、使節等多重角色，並探討了宋人對金統治下北方地區的一般想像。<sup>31</sup> 吳雅婷在〈移動的風貌：宋代旅行活動的社會文化內涵〉一文中，通過對《高昌行記》、《北行日錄》的研究，認為「王延德也好，樓鑰也好，他們的書寫都反映出一種旅人的視線。而目光投射的方向與蘊蓄於旅人之身的歷史文化結構密切相關」，強調自身情感、知識結構與出行觀察之間的互動。<sup>32</sup>

## (二) 文學的研究

從宋代陳仁玉將自己的各地遊記彙集為《遊志篇》開始，遊記文學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影響中國文人的文學創作。<sup>33</sup> 其後元代陶宗儀編的《遊志續編》，「繼宋陳仁玉《遊志》而作，所載多唐宋元人遊覽之作，……凡四十有八家」，<sup>34</sup> 為遊記創作提供經典、範本，促成遊記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在陶編的《遊志續編》中，收

入的劉祁《北使記》無疑是典型的元代出使異域行記，但是古代遊記選集者更多出於文學價值而非史學價值的考量。所以除了少數廣為流傳的異域遊記，如范成大的《攬轡錄》，大量出使行記未能得到普遍關注。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遊記文學研究開始興盛起來，不僅出現各式遊記選集，對遊記文學的特質、敘事風格、思想內涵進行了廣泛討論。<sup>35</sup> 出使行記作為遊記中的重要組成，也得到相當程度的研究。

在何瞻為《印第安那中國傳統文學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撰寫「遊記文學」(travel record literature) 的詞條中，將出使行記列入遊記文學的一種。<sup>36</sup> 他認為作為遊記具有以下特徵：是對某次出遊的第一手記載、以日繫事的日記文體、客觀記敘歷史或地理、闡發主觀情感，並依此將宋代以來的遊記文學分為三類，一日遊覽記 (daytrip essays)、江河遊記 (river diaries) 和出使行記 (embassy accounts)。<sup>37</sup> 近代日記研究專家陳左高則將宋代「出使行記」歸為日記類文學，與何瞻的歸類雖然用詞不一，

- 30 藍克利著，顧良譯，〈政治與地理論辯——1075 年宋遼邊界談判〉，田餘慶主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 182-197。關於此次邊界問題及背景，還可以參見 Klaus Tietze, "The Liao-Sung Border Conflict of 1074-76," Wolfgang Bauer, ed.,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pp. 127-151; 陶晉生，〈宋遼邊界交涉的問題〉，《宋遼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31-139。
- 31 Linda Walton, "Diary of a Journey to the North": Lou Yue's *Beixing Rilü*,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002): 1-38。關於北宋對幽雲地區的想像，可以參見楊宇勳，〈簞食漿壺迎王師：宋徽宗朝君臣對收復幽雲的想像〉（臺北：第二屆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頁 73-102。
- 32 吳雅婷，〈移動的風貌：宋代旅行活動的社會文化內涵〉（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7），頁 295。
- 33 Bokenkamp 認為雖然從陳仁玉開始，便將這種與出行有關的文章類型稱為「遊」志。但從後文來看，「遊」的含義常常超出旅行的範圍。見 Stephen R. Bokenkamp, "Book Review: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1, No. 3 (Jul. - Sep., 1991): 620.
- 34 《四庫未收書提要·遊志續編二卷提要》，《遊志續編》本（《宛委別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頁 1。
- 35 參見 Jonathan Chaves, Book Review: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1 (Spr. 1995): 235. Lionel M. Jensen, Book Review: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3 (Aug. 1995): 824-825.
- 36 James M. Hargett, "Yu-chi wen-hsiieh,"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1986), p. 936.
- 37 一日遊覽記，記述的是對某一特定場所的流覽情況；江河遊記記錄在宋境之內遊歷的經歷，作者常常是赴任新職的官員，代表作有陸遊的《入蜀記》和范成大的《騷轡錄》、《吳船錄》，見 James M. Hargett,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Travel Records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7.1, 1/2 (Jul. 1985): 67-93。他評點出最詳實完整的（the most detailed and complete）五部宋代出使行記，分別為《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樓鑰《北行日錄》，范成大《攬轡錄》、周輝《北轅錄》和程卓的《使金錄》。陳學霖的研究也贊同此觀點。

但內涵基本一致，都強調其以日繫事的日記文體。他在《談宋代日記》中將宋代日記分為三類，紀遊類、紀傳類與史事類。<sup>38</sup> 在何瞻看來，客觀記敘地理歷史與闡發主觀情感是遊記的主要目的，反映了非個人、公開化的形式與代表自我意識的私人化模式之間的張力。但通過對比地理和歷史的準確記錄與遊記中記敘的感覺和印象，余光中指出為了區別於地理學著作，遊記必須超越對資訊的準確報告，表達作者的意見和情緒。<sup>39</sup> 可見無論對遊記文學和作為遊記文學形式之一的出使行記如何加以定義，都強調客觀歷史、地理知識與主觀情感的並存，而遊記文學正是通過在客觀知識記敘的基礎上，解放寫作中的個人、美學、道德因素而得以發展。<sup>40</sup>

宣立敦 (Richard E. Strassberg) 在《雕刻山水：中華帝國的遊記》(*Inscribed Landscape: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的序言中對遊記文學發展的歷史進行了清晰的梳理。在他的分析中，認為宋代面臨的兩個主要政治問題——黨政和外敵，對宋代遊記產生了三方面影響。首先，黨爭使大批文人成為貶謫的犧牲品，產生了如柳宗元《永州八記》似的遊記作品。<sup>41</sup> 其次，北宋末年開封的淪陷，激發出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這類追憶故都的作品。第三，在與異民族的外交談判和禮節

性拜訪中形成了出使行記。<sup>42</sup> 但正如齊皎瀚 (Jonathan Chaves) 在書評中寫到的，宋代的发展促進了個人的自然知識的增加、時空觀念的增強和個人旅行經驗的豐富，使得宋代成為遊記文學中的分水嶺。雖然宣立敦試圖構建中國遊記文學的發展史，但是在對宋代遊記的評價中沒有突出其特殊性與轉折性。<sup>43</sup>

具體的研究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通過比較各時代遊記文學、細讀某篇異域遊記的文本，對其語言、思想、情感加以闡述；另一種則是對重要的遊記文學進行翻譯。<sup>44</sup> 何瞻對范成大的研究正是其中的代表作。他在《中國 12 世紀的路上——范成大旅遊日記》(*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中將《攬轡錄》、《驂鸞錄》翻譯為英文。在《范成大與其紀遊日錄》中比較范成大的「石湖三錄」(《吳船錄》、《攬轡錄》、《驂鸞錄》)，提取其中共有的「旁觀遠眺」、「身入其境」兩種形容方式，並通過比較後代遊記與「石湖三錄」，認為范成大運用議論、典故、幽默與急轉的聯想 (flashback) 四種語言風格奠定古代遊記的典型。<sup>45</sup> 雖然何瞻在對遊記文學的特質闡述中指出，表達作者的主觀意見是不可忽視的一個特徵。

38 見陳左高，《談宋代日記》，《大公報》，1963 年 6 月 9 日。論及南宋日記之繁興，他認為首推紀遊類、次如史事類，出使行記即包含這兩類。見陳左高，《歷代日記叢談》（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序言，頁 2。

39 余光中，〈中國山水遊記的知性〉，《明報月刊》17.12(1982.12): 69-72。還有將兩者的區分描述成主觀寫作和客觀寫作之間的區別，周質平就主張徐霞客的散文是描述性的，而袁宏道的散文則是主觀化和個性化的。(Chou Chih-p'ing, *Yuan Ho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8, p. 112.)

40 參見 Richard 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57.

41 在其對唐代遊記文學的研究中，宣立敦提出「貶謫綜合症」(The Exilic Syndrome) 的說法，認為一方面，被貶文人在新天地中，通過對自然的體驗而實現精神的昇華，另一方面，文人又不斷地需要將這種昇華傳達給朝廷重要官員，以獲得重返權力中央的機會。而這裏宋代官員的大量貶謫與遊記的關係，無疑也是應承「貶謫綜合症」的說法加以闡釋。

42 Richard 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pp. 1-57。

43 Jonathan Chaves, "Book Review: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1 (Spring 1995), pp. 235-239.

44 除了上文已經提到翻譯為西文的出使行記外，遊記類的翻譯可以參考 Lionel M. Jensen, Book Review: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p. 824。

45 何瞻，〈范成大與其紀遊日錄〉，《杭州大學學報》1986.2: 62-70。此處翻譯為「紀遊日錄」並不符合何氏本人的觀點，「遊記文學」或更為準確。更進一步的是他以范成大的《攬轡錄》、《驂鸞錄》為基礎對宋代旅行、遊記文學、社會風俗所進行的研究。(James M. Hargett,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pp. 9-69.)



### 三、特色、問題與展望

兩宋出使行記在過往研究中不受重視，致使整理、研究不足。雖然出使行記的研究可以深化兩宋外交史的研究，但出使行記本身存在不可忽視的問題：

- (一) 現存出使行記大多較為零散，歷史學家常常就某一文本做細緻探討，忽略了作為整體的出使行記，更沒有將出使行記置於宋代外交體系下加以理解、闡釋，這使得出使行記必須面對代表性、普遍性的質疑。
- (二) 內容豐富的異域遊記常被用於社會史中，重建歷史場景中的城鎮風貌、商業狀況、人心向背等，但忽略了遊記作為個人經歷的記敘，容易在描述中參雜自我情感與思想，那麼如何判斷史料是真實的歷史記敘，還是包含了宋人對異域、故地的不同想像？相應的，如何討論出使行記蘊涵的主觀情感與意圖，並討論記錄內容的選擇與社會思想、「國家」情感的關係等問題？
- (三) 出使遼、金、蒙、高麗、西夏的行記必然存在現實政治、外交關係的差異，雖然可能涉及相同的區域，但需注意其中出使背景、使臣心態的細微區別，能否用一致的眼光看待這些出使行記？

除了「出使紀行」自身存在的問題，現存研究亦多有不足：前人對行記的研究由文獻學、歷史學和文學三個途徑展開。文獻學主要通過目錄學、校勘學等手段，盡可能輯佚散存於浩瀚史籍中的行記，考訂版本，並校注、翻譯部分行記。歷史學的研究側重關注文本的客觀記敘，由社會史、思想史的方法重現歷史細節，並結合其他傳世史料，探索知識、思想與政治之間的互動。文學的研究是將行記放在遊記文學發展史的脈絡中進行研究，更注重其寫作手法及其在遊記發展過程中的價值，描述其感情意圖和文中美學、道德性因素。如何從多角度對「出使紀行」進行研究，才能使「出使紀行」的研究立體化？除了對「出使紀行」內容的考察，還應該

要考慮「出使紀行」對宋代的影響：「出使紀行」與宋人對異域的知識之間有何關聯？「出使紀行」對宋人處理對外關係起到了何種作用？

綜合以上諸問題，筆者提出以下可能的途徑，以期有助學界研究：首先，將出使行記與宋代外交動態發展結合，關注行記的出現、發展、定型與宋代對外交聘的聯動關係。正如文學研究者已經指出的，出使行記作為遊記文學的一種類型，並非自古有之，而是伴隨五代以來對外交聘的增加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但是需注意北宋早期的出使行記多關注於異域逸事，與五代使臣出使、唐人域外遊記的關注相似。隨著異族政權與宋王朝「對等外交」的建立，行程錄逐漸成為官方要求的重要行記形式，異域遊記也更加注重主觀情感的表達，對異域逸事的記載也常常選擇與本國相關的古跡、事件。這一系列的變化與晚唐以來異族政權的強大、自我認同的建構、外交意識的興起，有著怎樣密切的關係？

其次，將出使行記的研究與外交制度史相結合，比較外交制度與實際操作之間的差異，討論新「國際秩序」下制度、政治文化的改變。在唐宋外交結構轉變的前提下，外交中的禮儀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以處理不同的外交關係。從典志角度，對文獻上的禮儀加以梳理，能夠展現制度上宋對唐禮的延續與調整。然而外交活動瞬息萬變，以「制定的」禮儀顯然不能夠應對「變動的」外交。將出使行記與常見史料記載比較，來討論制度與實際操作的差異，應當對使制度史的研究「動態化」、還原外交制度實現的途徑與空間有所裨益。

再次，將出使行記的研究放置於唐宋思想轉型的背景中，使之與「夷夏之辨」、「國是」問題聯繫起來，討論「出使行記」的思想背景與影響。正如上文已經提到的，各種行記中常常雜糅著真實與想像兩種記敘。完全辨別真實與想像難以做到，但可以討論使臣選擇記載出使之事的篩選眼光。必須承認，個人的知識、思想對使臣觀察角度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可以通過對行記的研讀，重建兩宋時一般的異域、故土的知識和思想。